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

YUYAN HE WENHUA PINGLUN JI

伍铁平 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

YUYAN HE WENHUA PINGLUN JI

伍铁平 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

伍铁平 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伍铁平著.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ISBN7-5619-0489-4

I. 语…

II. 伍…

III. ①东西文化—对比研究—文集 ②语言学—文集

IV. G0-53

责任印制: 孙健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02千字 印数: 1—1500册

定价: 23.00元

出版说明

伍铁平先生将他近年来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结集交我社出版。其中对语言学界存在的不良学风提出了批评。本文集的出版，目的是要开展学术争鸣，净化学术空气，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伍先生的观点和意见，作为一家之言，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甚至提出批评。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1996. 9. 25

前 言

本书虽名为“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评论同语言和文化有关的问题，一是评论同语言学有关的问题。由于英语的 linguistic、法语的 linguistique、德语的 linguistisch、俄语的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这几个形容词都既指“语言的”，又指“语言学”的，所以书题的另一切分法“语言评论”，实指语言学评论。只是因为如将书名称作“语言学、语言和文化评论集”，未免太累赘，只好采取简略的名称。

本书从性质上看，主要包括迥然不同的四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包括两篇文章，同我一贯十分敬重的季羨林老先生进行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总结清人正统派的学风，其中的一条是“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①。我虽然没有荣幸做季先生的弟子，同季先生的学术讨论也绝非“辩诘”，但季先生“从不以为忤”，令我十分感动。

第二部分是申小龙同志有关文化语言学部分著述的批评（有的是学术讨论^②）。我按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的在港刊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转载）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在本书中。从中读者可以看出，我的第一篇文章对他尽管有不少严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申小龙同志还写了少量有关汉语文字、音韵、训诂的文章。这有待这方面的专家进行评论。

厉的批评,但对他将语言和文化相联系的研究方向仍有所肯定,并曾对他寄予厚望。遗憾的是客观上可能受几个地方出版社不断约稿的影响,申小龙同志后来走上了将他的书反复重新组装,不断抄袭他人著述和译作,不注出处的错误道路;加之有些报刊对他进行了许多不符合事实、无原则的吹捧,这就使得我和我的学生不得不撰文批评这种文德和学风,免得贻误读者。然而申小龙同志必竟才44岁,我们仍寄厚望于他,希望他在端正学风、改正错误以后,做出令人信服的成就。

第三部分是对鲁枢元同志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涉及语言学部分的批评。我和我的学生孙逊在《外语学刊》1993年第2期发表了才一万字的文章,仅批评了该书中的一小部分错误,同时对他将语言学运用于文艺理论这一方向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鲁枢元同志对我们的正确批评不仅全部拒之门外,而且对我破口大骂,这就迫使我不得不撰写长文,将这本被文艺界个别人吹捧上天的书从语言学等角度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和批评,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第四部分着重批评《汉字文化》(民办刊物)的实际主编徐德江,因为他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第49页发文,吹捧他的“论著……代表当代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徐还自封为“教授”“研究员”“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因此我不得不将我批评他的种种有违语言学和文字学基础知识的文章收入本书,以正视听。

普希金说过:“评论是科学”,学术评论尤其是这样。我们力求做到每句话都有科学根据。但受水平限制,难免有各种缺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有三篇文章是我和我的两位学生、一位私淑弟子合写的,对此我在这三篇文章的题注中作了说明。但由于这三篇文章都是由我撰写主要部分并由我最后定稿,三文在全书中占的比重很小,

所以封面上仅署了我的名字，我想读者和我的学生是能理解的。

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玷污了“批评”的名声，我国语言学界很少展开应有的学术评论（这是这些年有些错误百出的书文得以面世的一个原因）；加之我国素有“息事宁人”，“多栽花，少栽刺”的习俗，因此发表评论文章往往遇到阻力。在这种气氛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为了百家争鸣和端正学风，决定出版这本书，对此，我深表谢意。对力荐出版此书的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复旦大学杨剑桥教授以及支持我进行学术评论的许多学者，特别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黄建华教授、桂诗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戚雨村教授、复旦大学胡裕树、许宝华、宗廷虎教授、新疆大学徐思益教授、山东大学孙良明教授，我也一并表示感谢。北京大学叶蜚声、索振羽、苏培成教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周有光先生、王均教授、尹斌庸副研究员、我校王宁、童庆柄、程正民、邹晓丽、罗钢、王一川、李国英教授、杨润陆、李壮鹰、岑运强副教授分别读过书中所收的一些文章，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特此一并致谢。最后我还要感谢先后发表过本书所收论文的《东西方文化研究》主编钟敬文、何兹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责编申坚同志、《福建外语》正副主编许崇信、陈维振、周复教授、《北方论丛》主编陈世澂编审、《湖北大学学报》责编刘宋川同志、《争鸣》责编马雪松同志、《外语学刊》主编钟国华教授、《现代外语》正副主编张达三、钱冠连教授、《外语教学》主编孙天义、袁崇章教授，《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张后尘教授、《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主编周双利教授和责编刘永良同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社长赵金铭教授和副社长王建勤副教授对本书书稿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北京师范大学

伍铁平

1996年5月

目 录

前言

21 世纪西方文化会让位于东方文化吗?	(1)
再谈 21 世纪西方文化是否将让位于东方文化	(14)

论语言的比较和文化的比较	(27)
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	(48)
要注意学术研究中的文德和学风问题	(81)
对读者要高度负责	(89)
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	(129)

八〇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	(175)
讨论语言和文字问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201)
学风是关系学科存亡的大问题	(249)

评鲁枢元著《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

中的若干语言学观点	(261)
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理论	(272)
评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307)

不要胡批索绪尔	(315)
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本知识不能违背	(329)
不要歪曲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现状	(341)

学问不是吹出来的·····	(350)
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	(357)
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 ·····	(367)

附 录：伍铁平撰写的未收入本书的学术评论论文目录 ·····	(376)
-----------------------------------	-------

21 世纪西方文化会让位于东方文化吗？*

——与季羨林先生商榷

季羨林先生在《再谈东方文化》（《群言》1991 年第 5 期，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 31 期 [1992 年 9 月号] 转载：本文所引季老的话除单独注明者外，均出自该文）一文中说“到了 21 世纪……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对这种观点我和我的研究生范俊军合写的《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同上引港刊第 36 期，并刊《北方论丛》1992 年第 2 期，二处所刊该文个别地方略有出入）提出了异议。我们在文中指出：“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除开对汉语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外，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语言学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汉语、印地语、日语等东方语言学著作，他们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语言研究状况了解得不多，申（指申小龙）怎么能轻易断言，‘当代语言学的钟摆正摆向东方’呢？只有对世界语言学状况知之甚少的人才会出此狂言。这同国内有人说‘到了 21 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一样，反映了一种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我们不可因批判要将中国全盘西化的观点错误就提倡将世界全盘东化”。我没有料到，季老在读了我们的文章后，在上引港刊第 37 期发表了一篇短文《对于〈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的一

* 本文原刊《争鸣》（江西社联主办的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1994 年第 1 期。

点意见》，说“轻轻的或者重重的一顶‘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的帽子似乎就这样扣了下来！我实在觉得非常遗憾！‘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即使这些话完全是真实的，难道就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吗？如果我学习伍、范两位先生的做法也来祭起一顶帽子：‘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请问伍、范两位先生，你们能承受得了吗？”“我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欢迎讨论。但是必须首先丢掉帽子，屏除罗织，对我的想法有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了解。”由于季老并没有正面地进一步阐述他提出的“让位论”的“全面的”观点究竟是什么，而只是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1992年3月10日《文汇报》）和《“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后文增加了一些论证），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对季老的上述观点及其论证提出我的看法，以便获得季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

首先我想指出，承认“除开对汉语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外，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这绝不是“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文》1957年第3期说“如果我们不承认中国语言学的落后，我们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季老自己也说：“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语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1]这只不过是我国语言学从总体上说

比较落后的一个侧面的反映。难道这些说法也是“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其次，我想说明我们在文中所用的“沙文主义”一词，绝不同于《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给该词下的定义：“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自己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因为我们谈的是学术问题，上引季老的结论绝对不涉及“反动”“侵略性”“资产阶级”“煽动民族仇恨”“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等问题。我们这儿所说的“沙文主义”指的是西方部分语言中 chauvinism（英语：沙文主义）常用的那种意义：“对自己国家过份的、常常是盲目的赞赏”（英国《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扭曲的、盲目的爱国主义”（H. C. Wyld）《通用英语词典》，伦敦，1956年），“没有根据地热衷于自己国家的荣誉”（《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988年，北京）；G. Wahrig 编的《德语词典》（1927年）对 Chauvinismus（沙文主义）的注释也是“对自己国家的过份的热爱”；F. Palazzi 编的《最新意大利语词典》（1939年）对 sciovinismo（沙文主义）的注释也是“对自己国家的过份的爱和自豪”。由此可见。西方日常用语中的“沙文主义”并不是什么“帽子”。至少不是像季老所说的“我们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那样扣帽子”的那种帽子，因为那通常都是政治帽子，而我们文章中所说的“大国或大东方沙文主义”绝非政治帽子。英语中“大男子主义”是 male chauvinism（字面翻译是“男子沙文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在英语日常用语中“沙文主义”绝非政治帽子。chauvinisme 这个词 1831 年出现于法国。我国解放前出版的《辞海》没有收这个词。苏联出版的几部俄语大词典对“沙文主义”的解释同我国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基本相同。我怀疑我国上述词书的定义很可能是照搬苏联的有关定义。这些定义可能适合于政治领域，但是并没

有全面地反映西方的 chauvinism, Chauvinismus, sciovinismo。这个词的涵义。

根据以上分析,我想慎重声明,我们批评“当代语言学的钟摆正在向东方”(申小龙语),“到了 21 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袁晓园、徐德江语)这三种提法反映了一种大国或者叫大东方沙文主义,指的只是盲目地、过份地、不恰当、不符合事实地夸大东方文化,包括东方和我国当代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而绝不包含上引《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给“沙文主义”所下定义中的那些政治涵义。

(二)

我完全相信,季老提出“21 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是出自善良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作为东方人的自豪感,这种激情和自豪感的确比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要好。然而,提出一个科学的论断时不能光凭激情。非常遗憾的是季老一再提出上述论断,并认为“这种取代(指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条人类历史发展启示的规律”“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这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给我的启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取代在 21 世纪中就将看出分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做出上述论断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也没有说明有哪些迹象表明将发生这种取代。季老提出了两点理由证明其“取代论”或“让位论”: (1) “东方的思

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作为论证，季老说“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400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够分析下去”。接着季老赞同地引用金吾伦的话，说“无限可分论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

对这种说法我想提出两个问题：（甲）分析和综合可以那样截然地分割开吗？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年）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形而上学把分析和综合当做两个相互排斥的方法对立起来。与此相反，唯物主义辩证法教导我们说：分析和综合是统一的。恩格斯写道：‘思维就是把意识的对象分解成各个部分，同样也就是把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综合成为统一体。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列宁指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如果不把具体的东西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和因素，不加以分析，那末就不可能认识这个具体的东西。如果化学家不能分析出化学过程中的各组成部分——化学元素、原子、分子，那末他对化学过程，对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的规律就会一无所知。同样，如果经济学家不通过分析去找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商品、价格、价值、剩余价值等等，去认识它们的本质，那末他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发展规律也就会一无所知。

“然而，分析还不能单独地提供对事物的完整认识，它还需要有综合来补充，因为综合是根据分析的结果而把各种事物和现象作为整体来认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供了辩证认识的范例，他不限于只运用分析。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后，又做了出色的综合，这种综合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就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规律的辩证的相互联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34—35页）由此可见，笼

统地说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是不符合事实的。

（乙）我不是物理学家，对于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只是想指出物质是客观存在，哲学和物理学上所说的物质在东方和西方并没有任何差别。如果说物质的确是无限可分的，这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据此说分析是“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何况主张物质无限可分论的毛泽东不是西方人，而是东方人。季文所引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如果的确包含物质无限可分论的思想，庄子也不是西方人，而是东方人。反过来说，如果物质并非无限可分，这在东方和西方也是一样的，这同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点也没有关联，因为归根结底，是存在决定意识（包括思维方式），而绝不是相反。

（2）季老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我不知道，季老所说的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否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思维。季老用的是全称判断，按他的话进行逻辑分析是应该包括的。我想不用我说，季老大概也会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打击面过宽，过份贬低西方的所有哲学。西方的绝大部分哲学家大概是不会同意这种论断的。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博大精深的庞大体系，季老对西方哲学思维所做的上述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他们的哲学。季老提到他是“相信辩证法的”。发端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之一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恩格斯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

的总体”；“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2]怎么能笼统地说西方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细节之间的联系……缺乏宏观的概括”呢？

季老认为“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作为例证，季老说：“中医在这方面……胜过西医……中医……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较西医更合乎辩证法”。西医是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医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实，严格说来，中医是汉族人的医学，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境内还有蒙医、藏医等），季老的“取代论”是否也指 21 世纪西医将逐步让位于中医呢？季老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然而，从逻辑上说，季老的“取代论”必然导致上述结论。贬低中医肯定是错误的，贬低西医也同样不对。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补充，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这同整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应是互补，而不是取代，是同一个道理。其实，中医虽然主张“综合治本”，但中医诊断中的“问闻望切”中既有综合也有分析；西医中也不可能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否则不可能根据多项参数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患了什么的科学结论。1993 年 3 月 8 日的《北京自学考试报》所刊北京中医学院副教授杨维益的文章《〈中医诊断学〉的自学》中指出，“中医已经开始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及手段”：舌诊时采用生理、生化测定、血液流变学研究、活体显微镜检查等。这些科学方法中肯定既有综合的因素，也有分析的作用。笼统地说“西医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宣传把人体分割开来”，中医“较西医更合乎辩证法”，西医大夫未必同意。我亲眼见到我的一位同事腿痛，西医大夫经过多方检查，发现病根是别的部位（不是腿）癌细胞扩散的结果，可见西医并非全是脚痛治脚。中医恐怕也不会像季老所说，全是“医头痛从脚上下手”，也要具体病情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治疗

方法。

上面是针对季老的论证提出的两点疑问。下面我再正面地阐述，为什么“取代论”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1)“文化”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辞海》给“文化”下的定义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在这个定义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 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2)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文化（指狭义）具有阶级性；3)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除非 21 世纪将消灭阶级、世界大同、民族融合、语言融合，我们似乎没有根据预言，21 世纪西方会放弃与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会消灭其有阶级性内容的那部分文化和中断其文化的历史连续性，改而采用东方文化。“文化”包括文学、音乐、美术等。在这些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文化方面，西方更不会也没有必要在可见的未来让位于东方。何况“东方”本身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目前和 21 世纪的东方未必有统一的文化。东方既有中国、越南和朝鲜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有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或）封建主义文化；既有绝大部分汉族人的无神论文化，又有在我国藏族中，在印度、泰国、缅甸等地广泛传播的佛教文化，还有我国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回族和亚洲不少地方信奉的伊斯兰教文化（在目前和可见的未来，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知